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九期 ——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7d)

【往事追忆】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高晓岩
【学术争鸣】关于“桃园经验”	钱伯城
【史海钩沉】章士钊调停毛、刘矛盾	王同策
【文献资料】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记录稿(之二)	
【历史标本】荫余堂里看文革	程映虹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候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 高晓岩 •

四清运动是一桩历史公案，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两位历史巨人的分歧在运动中公开化。本文采访的两名对象，刘源（现任武警总队副政委）是刘少奇与王光美之子，他在文革开始时期，曾耳闻父母对有关问题的说法；何家栋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的顾问，对刘少奇研究有素，又曾就相关主题采访过王光美本人。他们使用第一手材料，又援引有关文献资料，对这一段历史公案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判断。刘源何家栋审定了文稿。

对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结论。相信本文的发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论断，并认真地反思历史。

一、“四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四清运动肇因于 1963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

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

对刘少奇素有研究的何家栋说：“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在这次会上，两人共同确定在全国展开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运动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确定搞“四清”之后，刘少奇就准备出国访问。在这期间，指导运动的文件紧锣密鼓制定起来。刘少奇之子刘源说，“这一年一四五月份，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等他们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出笼。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关于形势估计和运动性质的提法未表异议。”

在当时，刘少奇或许并未意识到同毛的分歧，以为运动会按自己的思路展开。他支持毛搞运动的前提是，认为干部党员确实需要洗一场澡，革除特殊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多吃多占、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不良现象，平息民怨。他有一种危机感。“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何家栋说，刘少奇发现，下面普遍不说真话，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

二、王光美和“桃园经验”

搞四清，刘少奇的思路仍旧是先调查研究。为了获得一手材料，他决定派夫人下去蹲点，这里有率先垂范的意思，因为国务繁忙，只好派夫人下去，此其一；王光美长期担任刘的秘书，懂得其思想，又一起在湖南搞过调查，此其二。

但引起了麻烦。“父亲所在的党支部批评父亲，认为这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大家担心我母亲下乡后，父亲的身体没人照顾……父亲患有失眠症，晚上须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平时都是母亲精心照料，如果夜间无人，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刘源说，刘少奇晚上一般有这样的习惯，吃完药，躺在床上看文件，然后上厕所，再入睡。有一次入厕时，药性发作，摔到地上，头都磕破了，王光美吓坏了，叫警卫员才抬上床。周恩来知道后，到刘宅严厉批评了王光美。意思是，刘少奇的身体不仅仅只是刘本人和家庭的，他还属于党和人民。刘源说，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支部反对她下去，并要刘接受。刘少奇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王光美走后，自己在地板上打地铺。就这样，他一睡就是五年，一直睡到1968年病危。

王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去的地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一去就是五个月。离京前，她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说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为了有利于工作，她改名叫“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做一个普通队员，被分配到桃园大队工作组，任副组长。

刘源说，王光美每月回来一次，跟刘谈体会，向毛泽东汇报。毛听了汇报，不止一次指示道：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她说，自己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她不知如何挖上边的根子。

五个月精细地调查工作后，1964年7月5日，她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这个长达十余万言的讲稿被称为“桃园经验”。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亲自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他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到文革中，大字报说桃园经验是刘少奇推向全国的大毒草，正在读初中的刘源回家追问父亲，“第二天午饭时，父亲拍拍兜，对我说‘我带来了文件’，”刘源说：“母亲特紧张，看看窗外，怕有人看见。父亲拿出文件让我看，上面果然有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非常好，我意值得推荐，予以批转全国。下面还有好多用笔划来划去的字。我还没看完，母亲就把文件收回去。父亲说：‘你不该看文件，但我们给你看，是让你知道，你的父母从不欺骗你。’”

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1964年9月1日，刘少奇才在前面加了按语，称其“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刘同时又指出：桃园经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

王光美说，毛泽东多次鼓励她，让她到各地去讲。“毛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要他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何家栋说：“后来，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弄出更对毛泽东胃口的经验，一下子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毛备加赞赏。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原编者注）”

三、刘少奇逼干部下乡

刘少奇派夫人下乡蹲点，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但各级干部却不愿下去。刘便通过视察讲话，加压，逼人们下去。

记者从许多材料里看到，他在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找地委书记座谈，不厌其烦地介绍蹲点方法，讲解在四清中应注意和把握的政策问题。

刘还现身说法：“1961年胡乔木带了一个工作组，在湖南的天华大队搞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未搞出问题来，我住了18天发现了问题，然后就找县长，叫他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扎根串连，没让支书参加，支书就造谣，说我搞乱了，耽误生产，……一个大队干部就有这样的本事。”

在湖南他批评道：最近我到几个省跑了一下，我一听那些发言，就听出他们是未下去过的，长期听汇报，就这样领导工作，“整个党，整个政府就这样领导工作，这样下决心、下指示，危险得很。如果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我看我们要灭亡。就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的尽是从基层干部那里来的，表是他们填的，汇报是他们那里来的。什么我们中央在领导他们，还不是他们领导我们。”刘愤激地说，我看我们现在，不是省、地、县、中央在领导基层，而是基层在领导省、地、县和中央，你们相不相信，实际上是。

刘说，听汇报不可靠，因为基层干部最重要的情况不告诉我们，看报表更不可靠。有一个地方，会还没开，就把报告写好了往上面送，会议到了多少人，诉苦的有多少，发言的有多少，占百分之几，情况都有。但是会还没开。

刘在江苏时，问省委书记江渭清：你做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了，你现在了解江苏的情况比十年前多了还是少了？江不好答复。刘就批评道：“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我说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还追问：“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

刘少奇要中央组织部部长下文：不下去不能当官。这样，没过多久，180多名正副部长、一千多名司局长都下去了。刘高兴地说：这就很好了，这就像个革命的样子了。这是个大革命。

刘源说，“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何家栋说，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即《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原编者注）。毛泽东称赞“后十条”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去同一个队参与社教。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这次去的是河北省新城县高镇大队。刘源说，“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人心惶惶。王光美向刘少奇汇报了看到的情况，引起刘的高度注意，正好组织部长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怀疑一切的倾向。刘立即批转全国，指出：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让她到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人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四、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与决裂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何家栋说，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

会议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上，两个主席争论起来：刘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包括在自己的生日晚宴上，毛对刘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意味着“四不清”干部都得成为敌人。

刘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缓地解释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激动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

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原编辑注）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

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这天，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通知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到北京厅时，发现夫人在场，一下子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她的对面，四目相望，却不好说什么。”刘源说。

毛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转脸问刘：“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连，搞神秘化”。毛严厉批评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的一通批评，叫人摸不着头脑。

组织部长见局面不好收拾，请出开国元勋从中调解。陶铸、安子文又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顾全大局，主动向元帅们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这次冲突结束后，在原二十条基础上修订颁布了“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出来之后，运动陡然降温，”何家栋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文件纠正了‘左’，更重要的是，由于目的变了，不是搞“教育”，而是对敌斗争。敌人在哪里？谁是走资派？找不着目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自己都想不通，就更不可能积极指挥运动了。文革一起，‘四清’便不了了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即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刘源在外面看到了就回来问刘少奇：什么是“形‘左’实右”（毛大字报结尾句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原编者注）？“我讲自己在外面看到的一切，父亲什么都听，一放筷子就开始讲，有时一讲就是两个小时，母亲话比父亲多，父亲从不反对，就说明是真的。”刘少奇对儿子讲述了上面那场冲突的惊心动魄的过程，文革结束后组织部长安子文也对刘源追忆了整个事件的见闻。

说到“1962年的右倾”，刘源记起他父亲讲过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一幕。

那是1962年2月和5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

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外地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王说对了，田果然领会错了毛的意思。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动，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也冷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以为得到理解，总算长舒口气。谁知七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毛突然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原定的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何家栋慨叹，“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却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激情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1966年3月，刘少奇针对“四清”写下了一段话：“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做。”何家栋评论说，“这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早了十几年，而且更准确。”

五、刘、毛分歧的背后

波澜起伏的“四清”运动结束了，留下无数个谜团和疑团。人们不明白，刘和毛之间为何由战友变为对手，他们两人的分歧背后究竟是什么？

何家栋说：“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建国思路，做历史的回顾。毛泽东最杰出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思想，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民主主义的超越，为党提供了意识形态武器。但遗憾的是，他过早否定了自己的伟大创造。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毛却指责‘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份送进历史博物馆。刘少奇一直坚持并创造性地执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思想，取得巨大成绩。刘认为，由于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土改到四清，刘少奇一直都把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列为大敌，把我党的腐败根源归结于此。”

刘源说，“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是阶级分化出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有人或许要问：刘和毛既然都强调阶级斗争，那么，区分“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意义呢？

刘源指出：在四清中，刘少奇也强调反对资产阶级，但实际上指的是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由等级分化产生出的官僚资产阶级。

刘源认为，“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他还说过，‘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何家栋认为，“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尽管刘少奇坚持了毛泽东的‘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但并不意味着是指在敌人手里。他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意见、但多次强调，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强调矛盾不上缴，就地处理，分别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

许多过来人很难弄明白：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一直紧跟毛泽东，处处迁就附和，为何还被毛泽东斥责为“形‘左’实右”？

何家栋解释说：“所谓形‘左’实右，指的是，刘开展大规模教育运动，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桃园大队四清只开除了一个贪污腐败的支部书记的党籍，其他退赔好、检讨好的干部都恢复了工作，怎么是打击一大片？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陈伯达在小站一下子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毛倒很赞赏。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则发动群众革命，用‘大民主’对付假想敌，使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否可以这么说：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得逞？我作为记者时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戚本禹1979年交待：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批刘右倾，响应者无几；批形‘左’实右，响应者无几；刘是机会主义，党内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看不出来。恩来同意。毛最不满意的是，刘少奇在批评江渭清时说，毛泽东思想是我提的，现在我不提了，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是教条主义。我查了刘少奇的谈话记录，没有前两句，后一句原话是，‘就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

何家栋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这也是他的最大失败，最大的自我否定。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第五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泽东留下的理论遗产还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

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空壳了。”

对四清运动应该如何评价呢？

何家栋认为：“四清，早已经成为历史，但桃园经验却散发着活力。王光美的这份汇报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真正共产党人的调查，简洁生动的叙事，细致、直追真相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我看还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纪实作品，在当代可以作为纪律检查部门的必读书，还可以作为记者采访的入门书。毛泽东的所谓形‘左’实右，作为当事者，也许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难以看清想透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后世的学者专家，甚至当年的省委书记，至今回忆评价，仍是一团浆糊，甚至间或还夹着私情私怨，真正还是四不清，这就难以正确总结经验，难以警醒后人了。”

刘源这样评价四清运动中的刘少奇：“在力图保持廉洁、保护群众利益、扫除恶霸特权、落实主权在民方面，他做了一次可贵的尝试。”

~~~~~

#### 【学术争鸣】

#### 关于“桃园经验”

• 钱伯城 •

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至2001年1月已第五次印刷。2001年2月3日的《文汇报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文，更受读者注目。文中谈到“桃园经验”由中共中央批转推广的经过，是这样叙述的：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早在1998年11月20日的《南方周末》的《解密》版，就发表了该报驻京记者高晓岩对刘源（刘少奇之子，时任武警总队副政委）、何家栋（时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顾问）的访谈录，报导了他们关于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这一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所谈“桃园经验”推向全国的经过，与上引记述同；在访谈录最后，何家栋又独自发表了对“桃园经验”的评论。访谈录写道：

何家栋认为：四清，早已成为历史，但桃园经验却散发着活力。王光美的这份汇报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真正共产党人的调查，简洁生动的叙事，细致、直追真相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我看还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纪实作品，在当代可以作为纪律检查部门的必读书，还可以作为记者采访的入门书。毛泽东的所谓形“左”实右，作为当事者，也许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难以看清想透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后世的学者专家，甚至当年的省委书记，至今回忆评价，仍是一团浆糊，甚至间或还夹着私情私怨，真正还是四不清，这就难以正确总结经验，难以警醒后人了。



据上所述“桃园经验”推出经过，应涉及下列三个问题：

一、“桃园经验”系受毛泽东欣赏推荐，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国。

二、在后，陈伯达“小站经验”报告，亦受毛表彰，批传全国。

三、“桃园经验”评价，访谈录提出可作当代纪检必读书和记者采访入门书。这是新颖的一家之说（2000年7月出版的《“四清”疑团》未见此一提法），未知纪检与记者部门有无照办。

按“桃园经验”正式名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于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的总结，并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桃园经验”的内容，《刘少奇年谱》1964年8月19日条云：“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从《年谱》所概括的“桃园经验”主要内容看，这个“经验”充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照这个“经验”搞下去，势必走向“扩大化”。事实证明也是如此。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执行者与参与者，他指出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回顾》，1114—1115页、1125页、1127页）。刘、何的文章说：桃园工作组“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110页）。倒是进一步证明斗争会及打人捕人这些事件的普遍性。当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近年回顾四清运动，也说：“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向明《任仲夷反省历次政治运动》，2000年8月17日《南方周末·解密版》）薄一波和任仲夷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高层领导，对四清运动都有切身的体验，他们的回忆与论述，不仅亲历，且有文件与可凭查证的事实根据，比起一般的听闻传说，自然可靠可信。

关于“桃园经验”与毛泽东的关系，毛对这份“经验”的表态，目前所能看到的已公开的中央档案，仅有1964年8月27日毛在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语及有关注释中可以看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144—145页）。毛泽东的批语道：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同志意见的。

据注释，这个批语是因刘少奇1964年8月19日为报送代中央拟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而写的。刘少奇的信是这样写的：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样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刘少奇年谱》600—601页亦载此信，但末段删

略。)

刘少奇为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在信中特别强调陈伯达的“极力主张”，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为了推出王光美和她的报告，加重其份量，所以不惜借陈伯达以自重，以此避开偏向老婆之嫌。然而，尽管如此，刘少奇仍无法不叫人看出这个问题上的“软档”。毛泽东的批语就颇堪玩味，他不直接批示“同意少奇同志意见”，却在“少奇同志”前面加上“陈伯达”的名字，而且表达的句式为：“我是同意……的”云云，语气并不自然，带有勉强意思。刘少奇大概只看了毛的“同意”二字，很快于1964年9月1日签发，正式将“桃园经验”下发，中央的批语即刘少奇所拟稿（分见《文稿》第十一册，144页；《年谱》下卷，601页；《回顾》下卷，1122页）。10月24日，刘少奇又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由陈伯达一手搞的、以天津市委名义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回顾》下卷，1122页）。指示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年谱》下卷，608页）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刘少奇为了酬报陈伯达“极力主张”推出“桃园经验”之功，而迅速推出了陈的“小站经验”，不自觉地陷入了陈伯达为求推出自己的“经验”，利用刘的“软档”而设下的圈套。应该指出，这时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有权签发除非他认为有必要向毛请示以外的一切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并代拟批示。“桃园经验”因是王光美的报告，为尊重毛的意见，所以写信请示，表示不是自作主张；陈伯达的“小站经验”，无此顾虑，就径行签发了。当然，这样径行签发的多了，请示少了，毛会觉得管的事也少了，有了失落感。因此发生有一天他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责问：“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回顾》下卷，1131页）

因此，从现有的有关资料看，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桃园经验”和“小站经验”，都是由刘少奇而不是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毛泽东曾对“桃园经验”有过某种口头表示或推荐给一些人看，虽然有此可能（出于欲擒故纵的策略考虑），但决不会大加欣赏，并要求到处宣讲推向全国。相反，从江青对待“桃园经验”的态度，倒可窥见毛的一二心态。1964年底，时任广东省委分工负责工交企业的曾志（陶铸夫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据她回忆：“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431—432页）。按江青的“不满意”，实质反映毛泽东态度。曾志提供的亲身经历见闻，可澄清毛曾欣赏并推荐“桃园经验”之说。如此次为大区书记安排报告会，即非毛的主意。而刘少奇积极推出“桃园经验”及其报告人，以求前台效应，殊不知适得其反，是一条取祸之道。

由“桃园经验”产生的是是非非，且至今评说不一，我以为当前历史学界在审视或研究当代历史时，不应回避如下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开国高层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老婆关”现象，另一是后人（特别是名人的后人）如何尊重历史、叙述诚实的历史。

什么叫“老婆关”现象呢？我请大家一读黄伟经著《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这本书记录了“这位充满了爱国激情的老革命家和老作家”（季羨林序中语）黄秋耘的谈话，其中谈到开国初期有丈夫作正部长、妻子做副部长的事例时，说：“‘夫荣妻贵’呀，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不可一世的。”（《文学路上六十年》，77页）黄老快人快语，却一语道出了历史真相。不过还可加一句，叫“夫败妻辱”，这就完备了。丈夫与老婆，家庭地位平等，但丈夫是主要一方，政治权力在握，常会有意无意地分权老婆，让老婆分享权力，或增加丈夫权力。这就叫“老婆关”。越是有大权力的丈夫，越难过这关。毛泽东早觉察“老婆关”现象，他曾告诫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汪

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75页）遗憾的是，江青不听毛的警告，不仅长期做毛的秘书，文革初起即被放出后院，执掌大权，最终身败名裂，貽笑千古。倘使江青懂得一点循规蹈矩，安守本份，隐居后台，即使在毛身后，失去庇护，但“毛夫人”这顶桂冠及其尊贵身份是无人敢加非议的。这正是吃了没有过好“老婆关”的苦头。

刘少奇也曾预感“老婆关”问题的重要。据王光美记述，“有几次他（指刘少奇）谈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33页）但在实际行事中，刘少奇却明知故犯，一再委派王光美下去蹲点，出头露面，炫才扬己，为人所忌，招致羞辱。“老婆关”之不易过，有如此者！

林彪、叶群就不用说了，夫妻二人都是权欲狂，子女至以“首长”、“主任”称父母。林彪深居简出，叶群前台指挥，原以为“接班人”、“副统帅”名位已定，天下唾手可得。殊不知庐山会议，毛泽东玩弄二人于股掌之上；于是惊慌失措，仓皇出逃，命丧沙漠。林彪之过不了“老婆关”，是不足为奇的。

什么叫诚实的历史呢？简单说，凡叙述出来备人阅读的历史，必须是是即是，非即非；有则有，无则无。不容许有所粉饰、想象或推演。最怕的是把没有第三者在场，或虽有第三者在场，但均已亡故的“死无对证”的对话，写得出口成章、活灵活现，像写小说一样。名人的后代，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追念先人业绩，尤忌以感情代替事实，好事拉上一大堆，塑造一意为人民，高大完美形像。——但是这却成了近年无数出版的有关名人回忆录和回忆文章的通病。

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这篇回忆文章，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然而，为亲情所限，正如在这两句话前面，作者又有一句话：“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脱离他所置身的现实”，这篇文章所能做到的，顶多只有他所要求的一半（收集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十多篇文章，皆可作如是观）。这做到的一半，基本上为刘少奇洗刷“文革”中所受诬陷不实之词，同时并不讳言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时的某些过左失误，以及对毛泽东以整人为乐的批评，等等，都表示“作为后人”的作者对历史的尊重，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一半没有做到的部份，关于一些具体细节的描叙，却存在不少足以使读者引起或多或少的疑问，或者如人们对某事怀疑时所说的“将信将疑”。仅举一个例子，如文中所记述的1962年7月上旬某一天，刘少奇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畔，与毛泽东的一次单独会晤与谈话。“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90页）这下面附有一条注释：“除了刘源回忆刘少奇的叙述，另载于《访问王光美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7日）和王光美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文章。”我很相信这一事实确曾发生，但倘从史学角度论，这段记载有着明显的缺憾：第一、这次谈话缺少必要的旁证；第二，刘少奇在毛面前竟会如此慷慨陈词，与所有公私记载中的刘的性格不相符合。因此，这仅能说是一种亲人之间的传闻，作为史实采信，还需再作点考证。其实，真有爱于民的伟人，不需要依赖神化美化来拔高形像。

□ 原载《随笔》

~~~~~

【史海钩沉】

章士钊调停毛、刘矛盾

• 王同策 •

章含之在她《我与父亲章士钊》（《文汇报月刊》1988年第4期）和新近出版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报出版社2002年8月）以及她主编的《章士钊全集》中，都收入了“文革”期间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行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得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这两封信都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特别是研究“文革”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反映出章氏当时确实是竭尽全力地居中调停党和国家这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

要说章士钊的调停，再好的内容转述，也不可能达到直接阅读原文的效果，所以现将原信全文引述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维64年春节元日润公（毛泽东字润之——以下注释均为引者所加，不另说明）开教育会议于上海（此处为作者误记，应为北京），公与钊（章士钊自称）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堂。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屈，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但是）细绎（理出事物的头绪，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大都）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心公亮质（公正的心地，光明的本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人们对善的追求，都与我一样）；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这差不多）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年纪）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齿奇齿乞（咬，啃。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由）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表示态度极其诚恳。）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犹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即刻，马上）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原来是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责，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逐级聚积、株连与扩大）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

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从前，以往）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献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使国家强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楔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像，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您首先主动从事有利），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我们虽然现在还不能见到章氏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大体推知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请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得章氏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此前，在诸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指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但作为毛泽东个人，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截至目前止，很可能这是仅见的材料。全文是：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尚难”如同章之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那“尊计”也就只能“缓行”了。

在造反派几近丧失理智地“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在造反派的眼里，像章士钊的具体情况，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用不完的：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部总长，镇压学运的刽子手、鲁迅要打的“落水狗”，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封、资、修齐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俱全。谁能说出半个不字？这一点他本人比谁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义无反顾地从中调停全党全国的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真正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如果说他有可恃的是与毛的私谊甚厚，那一个接一个被批判打倒的刘、邓、陈毅、李达与毛的私谊，哪个又比他薄？

在此之前，当“红卫兵”抄了家以后，章先生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不仅未加责怪，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周利用这个批件，拉了一张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不少人是借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难的。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不揣冒昧、不怕风险地给毛、刘分别写这两封信。除此之外，人们尽可以

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

但是，无论怎么说，读过这封指责“文革”为“动乱”，认为给刘少奇横加罪名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先生不屈流俗、高瞻远瞩的卓越见地由衷折服，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难的“撄逆鳞”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不能不为他的侠肝义胆、耿直性格与果决作为表示钦敬。尤其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章先生这样经历极为复杂的民主人士，能够这样做，更为难能可贵。

~~~~~

## 【文献资料】

###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记录稿（之二）

（续上期）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下午

有什么消息呀？（总理：准备今晚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开大组会。）这要传达干什么？（总理：主席的话不传达，说咱们封锁。）不是，我讲的是是否符合事实。（总理：都符合的。）（康生：叫他们翻一翻《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在八九一页上。）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三三二页上，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个上面。）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李雪峰：苏区党代会，有个学生叫杨诚说，抗日抗日，民主民主。）（康生：是十二月会议。）（程世清：我们发现，主席未发表过的三篇文章，一个是告前线将士书。）那恐怕不对。（程世清：报上发表过。）（陈伯达：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也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农村调查序言》、《论政策》两篇文章写入了。）（《论政策》是七二〇页，《农村调查序言》是七四七页。）这个《论政策》有吗？（陈伯达：有。）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的，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总工会刘少奇（总理：留下的还有向忠发、项英。）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了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总理：有个名字姓蒋，什么先，还有个特务营。）他相信蒋介石的话，蒋介石有篇校长训词，因为这个人我熟悉，他在长沙师范，后来又在安源。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不算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出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A B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这个送信人叫朱××（名字没有听清楚），他躲在山上，现在内务部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把他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

有一点。（总理：有的。）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既与国民党决裂，就决裂吧，就一切斗争，没有联合了。如城市里小作坊都得没收。富农该联合，也不分田。资产阶级要分阶层，空喊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打倒，还在城市，只要不反对，一概不论。筹款还是要筹的，帝国主义、洋行它不来了，口号喊喊而已，我们住在乡村也像城市，政策方面是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作标准，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出发时大了，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以后基于我们党不要分裂，罗章龙湖南人哪，我相当熟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这么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罗章龙没有搞几天嘛。（总理：对，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许世友：他三零年末去的。）那是以后了，我认识他很早。这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相当熟。他在长辛店，“五·四”运动以前教职工夜校，他当教员，我跟他发生关系。在××。一九一八年一次大会，湖北英山，刘元震。（江青：张国焘很早就是叛徒，有大印。）那可能真的，但影响是大的。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不到，刘元震当他的代表，那时反的不少，刘元震、李立三、张国焘，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安源，一个在北京，总的在北京。那个反对是不对的，当中央一查，不少独立性，有没有？（董老：本来独立性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现在还要增为营教导员，连支部，团、师都有政委。在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你决裂吗，不管你小资本家一概打倒。列宁说富农都没敢……。但中国的富农不发达的，雇、贫、中农也按赞成人口分地，按人口平分，后头“六大”就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有些城市，大点的小城市如吉安、赣州等。但两次打，两次打不开。可以不打了。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于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想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到中央去请示，请不回去……（不清）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张打。要到后边去，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要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黄永胜不知道这些事，你那时干什么呀？（黄永胜：当排长。）项英来后当营长，（黄永胜：当团长了。）升得那么快呀！（黄永胜：是个小团，等于营。）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呀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打时期，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到四一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得到许多教训。打摩擦仗。有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中小城市那就破坏了，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你跟它就办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我与陈叔通说……（不清楚）他不赞成，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把他们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有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

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江青：是。）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师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大家笑。）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二百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十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总理：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大家笑。）（总理：一点不透风也不好。）

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分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总理：六、七亿。）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份，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份，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许世友：也不赞成的呀。）你那么多工厂管得了吗？要搞发个公布嘛！并照上一次时间不是几个人讲话吗？（总理：都是谁讲话呀！纪登奎搞了喷气式。）（叶群：身体、精神都好了。）可见病也可以治好的了。还有一个更惨。几个负责人，康老、伯达讲不？（答：讲。）不要讲长了。你们一讲就长了。（总理：有稿子。康生：是不是讲呀？）你说第二天再来，人家几分钟，不要那么死。康老、总理、黄永胜，你们讲话不要太长了。（康生：不超过十分钟。）反正我有个办法，一天开不完两天、三天，我每天不超过三个钟头。（康生：党章读不读？）不要。那是形式主义。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我当过校对的，小报越小越容易错字，那是几年的事了。搞湘江评论时，那时资产阶级世界观。（总理：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王洪文：很难呀！）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一个陈其康，他不选王明，“七大”时上，还有蒋光鼐……是黄埔教官，大



革命失败后，回到兴国，躲在刘乡村，消极了。我们红军下井冈山，到兴国后，请客吃饭，又出来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选他。（郑维山：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还是赞成你们这一点的。（大家笑。）王维同志，（王维：主席讲的传达了。）可以，有一期报（张国华：没有听清楚是什么报，可能是国民党的报。）是国民党十中全会，叛徒其中×××、×××选上了。我知道这两个人，我们提的这些人，在他那里可以是评议会的。我们又没有评议会。只好弄到一起。不晓得怎么没有傅××。（国民党开了十中全会，那儿有几个叛徒，是有的，但有些人没有，还不知道有个傅××。）（康老：可能死了。）也没有叶青。（总理：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张闻天、王稼祥。）（康老、董老：烂了。）（总理：还有杨勇。）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景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取一技之长。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康老：曾思玉注意一下。）（许世友：王景山开除了党籍。）（黄永胜：康×是他提的。）（许世友：王景山能打，过得硬。）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师搞的。）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你们政委是谁？（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总理：陈先瑞做实际工作。）你（指李雪峰同志）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李雪峰：也参加会。）（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时零五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

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总理：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周恩来同志发言后，林副主席发言。五时二十七分。）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五时三十五分）康生同志讲话。（五时五十八分）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六时十二分）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六时十九分）怎么办呀？同志们，别那么忙，（指摄影记者）你们都是很忙呀，叫做争分夺秒、你追我赶。（第一位记者进来了。）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六时二十九分）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三月十五日战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孙玉国向毛主席敬礼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起来鼓掌。六时三十八分，孙玉国讲完后，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起立鼓掌。）你多大年纪？（孙玉国：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你是哪里人？（孙答：东北人。）东北人呀？你老呢？（孙答：河北。）河北啊，他的名字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国家的国。他是副营长。负伤以后，珍宝岛十五号的自卫反击战就是他指挥的。（孙玉国讲话以后）怎么尉凤英也是辽宁的？尉凤英同志请讲话。（六时五十分）怎么办？别忙。（看表）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总理：是河南的。）请你，我的老朋友。他是河南的，他本人是山西人，一向在河南工作，也受到一些灾难啊，就是嘛。你讲。（七时零两分）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看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全体代表：赞成！热烈鼓掌。）我们付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热烈鼓掌。）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举手。

主席看看会场后）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一致举手。）看来也有希望了，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吃饭，散会！（七时零五分，结束。）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李旭英这个人过去好得很。这里有山东同志没有？野战军、华北有几个？（有人说：六个。）六个军只出了一个曾三圣，三圣有请（不清）。其他已“支左”。山西还有张日清。有的军队没有一个，并不意味着别的军队差一些，而是已兼了革委会主任。再说明，没有利用的好人还多。有的如好几个老同志，反而上了名单，恐怕那一个时期也会有的。比如程其康、张云逸这两位老同志，也就是因为资格老。总而言之，排上了的，大多数是好的，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但不一定太神秘，都那么理想。如八位到十位在中央工作，犯过错误，过去也犯过严重错误，你说不排入能行吗？头一次进中委的占大多数，这是第一次。“七大”没有，“八大”没有。八届的老人占五十三，新排上的两百多，老的五分之一不到，则产业工人与农民增多了。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黄永胜：算农民。）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黄永胜：小团。）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总理：农民只搞两头，免去中间，如吕玉兰。工人好办，规定劳动时间，张富贵到处跑，到处检讨，没有劳动。）（康生：他也执行了刘、邓路线，也反了红卫兵，看到天安门上主席接见红卫兵，他赞成了。）斗完就劳动，群众谅解了。一方面需要这些同志，工厂农村同志，一方面我们要这些积极分子。有的省提不出人，他不熟悉，证明工作有问题，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其实有些事务不管也可以。太多了也不好，不到三百人，二百七十九人也可以。剩下五百人就扩大化了嘛，公道不公道，我也不清楚，大体如此。要说完全公道，我也说不清楚，说不出个道理来。你们提得有理嘛（有同志插话：五本也难摆平。）一个组几本够吗？一个人发一本不好吗？人家当一个代表嘛。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大家笑）胡康呢？（有同志插话：刚加入党。）四川有四川那么大的省，你们提了几个呀？（答：十个。）山东五千万人，（有同志说：两个江苏哩。）恐怕困难的还是这三、四个老同志。要选他的话，如朱德检讨也检讨不清楚，不要写了，写了人家不满意。（有人插话：是董老给他解了围。）不能怪他了，他都忘记了，八十几了。如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总理说：“六大”请他去。请他去，他不去，我给他谈的。他说你“八·七”会议都丢了我了。）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帶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形”是形式，右的本质。怎么办？

你们去议吧，我没有睡觉。（总理：除主席外，按笔画排……）共产党比别的党好一些，他不花钱买（选）票，谭言方两边都送票子，还是选省议员。一个国议员要花多少钱呀？我有一个亲戚四、五个人花钱，买一个税务局长，时间三个月，所以赶快刮，把钱刮回来。有这么一个亲戚，也使我长见识。共产党不要买票，不要运动，不要抬棺游行。（南京国大选举，抬棺游行。）目的在保证了领导，就是中央委员会，则有时选举，有时没有。过去经常有的，“六大”我当选了，我并没有到莫斯科去。共产党比较纯洁，政治纲领适合要求的，王明十年之后开除不深入那时情况。后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嘛，不只是不买票嘛，党员嘛，总是要准备牺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各根据地，无论是豫、鄂、皖、井冈山，活的差不多了，抗日以来就多了。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如山西、贵州、山东要谈一谈。还要谈一谈，山东军队和省可以合并起来开一个会嘛，所以有的代表团冲一下，我也赞成。一个山东，一个山西。至于黑龙江，工作不错嘛，比如贵州你自我批评也不干，批一下不可以？至于选举还是要选举。一个张日清一个南萍。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王明是反对的。中央苏区邓、毛、古、谢，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划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主席、副主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这时主席找总理。）总理呢？（总理当时按照笔划排坐下了，坐在主席台上只有主席和林副主席二人，这时主席叫总理上台，总理上台去了。）

可以选自己。（检票延长时间，主席向王树声）比较好一点了吗？（王：好一点。）

你就是王国藩吗？王秀珍、王宏坤、王淮湘嘛，你是哪里人？看你年纪不大嘛！（王淮湘：十六军。）王超柱、王辉球、王新亭、邓子恢、王铁人我见了多次都记不清。王白旦三十几岁吗？马福生你河北的？（答：石家庄的。）丁盛哪里人？（答：江西的。）老表吗？（问王国藩）你们县叫什么县？（答：遵化。）王震同志你还在农垦部吗？（答：都下去了。）一个人都没有，你们怎么办呢？（答：到下边劳动去。）年纪太大了。

宣布选举结果。（这时宣布选举结果，我们主席，当党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当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副主席、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同志。一共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

（宣布结果以后，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总理：有个建议，有个名单，四十九名，办事组十名。办事组增加李天佑、李德生，原有五位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办事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还任新军委副主席。（林副主席：赞成。）（议事日程完了，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我没有话讲了。（姚文元：喊几句口号。）叫别人讲嘛。董老，你讲几句，老资格嘛。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  
【历史标本】

荫余堂里看文革

• 程映虹 •

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塞伦地方虽然不大，但却是一座历史名城。17世纪时这里发生过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迫害女巫案，今天有好几个博物馆保存着这段历史，有的还上演审判女巫的情节剧。和这段历史相联系，塞伦成了美国的鬼城，每年十月三十一日鬼节的晚上很多人化装成各种各样的鬼，满城鬼影憧憧。

塞伦也是美国最早和东亚建立海上贸易的港口，位于市中心的皮博迪爱塞克斯博物馆收集了很多近代美国和中国日本通商时收集的文物，其中有一个浙江宁波的宁式大床，放在展厅里象一座小屋，这样保存完好的古董今天即使在它的故乡也极为罕见了。

今年六月中旬塞伦的皮博迪爱塞克斯博物馆为中美文化交流史完成了一件盛举。博物馆把中国皖南黄山脚下的一座叫做荫余堂的大型民居完整地要从它的故乡搬到塞伦，在博物馆内由中美两国的工程师和工匠合作，重新把它一砖一瓦地按原样造好。这是一座由徽商建于两百年前的宅院，翠竹围绕着白墙黑瓦，为塞伦古色古香的殖民地建筑增添了东方文化的色彩。

然而当人们来到这座皖南民居参观时，不难在它那浓郁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发现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政治留下的痕迹。一踏进门厅，墙上就能看到1977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发布的标语口号，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从门厅向左转是一间卧房，所有的家具都是1949年以前打做的，但墙上贴着文化大革命时林彪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出版于文革前的宣传画，画面上几百个少年高举手臂加入少先队，他们的头上是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头像，说明文字是“在毛泽东的阳光下幸福成长。”

在门厅对面，传过天井是饭厅。饭厅的两面墙上贴着毛泽东手书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在当年指的是世界革命。墙上还贴着毛泽东一段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语录和一张“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宣传画。隔壁一间堆着杂物，有空棺材，小儿的站桶和一架手摇脱粒机，但在墙上贴着一张1967年某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大字套红标题新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济南广州兰州部队干部代表”。在另一间房间里可以看到毛泽东那张曾经贴遍神州大地的标准像。

这座民居的厨房被防火墙隔开。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这里能看到如今已很少见的灶台和大水缸，墙上虽然没有标语口号和毛泽东像，但饭橱中一摞饭碗上印的是林彪手书“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如果上到二楼，同样的布局和房间里却基本上看不到标语口号套红剪报和毛泽东像，相反有一些属于“四旧”的东西却保留了下来。例如有一间女性卧室的墙上贴着20—30年代润肤膏的彩色广告画，一个小家碧玉型的美人配着广告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永不褪色。”

皖南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农村中比较开化的地方，因为大量在沿海和都市地区活动的徽商给这里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影响。这座民居在当地并不算豪华，但其规模，建筑和家具（多数是1949年以前留下来的）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一般的农民企业家所负担得起的。在1949年以后，由于徽商的消失，皖南农村便和一般中国农村没有多少差别了。虽然历史和家族的影响仍然使得这里的农民不同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但荫余堂里的文革遗物至少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共政治在一个特定地区和中国农民互动的图景。一方面，共产党政治借助基层组织，群众运动和各种宣传媒体强行渗入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家庭，在人们的日常起居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家庭生活中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取代了宗教的迷信的和家族历史的符号，另一方面，只要稍微偏离公共视野，农民——至少是在皖南这个特定地方的农民——就在比较私密的空间拒绝党文化和党符号的介入，为自己的生活保持一点趣味和和谐。

更有趣的是，墙上的那些文革文字和图像中多次出现和林彪康生四人帮有关的内容，而它们却并没有随着这些人的垮台而被抹掉。这种遗迹在城市的民居里是很少能见到的。这种疏忽反映了政治环境一旦相对宽松，农民对所谓政治大是大非问题的冷漠就表露无遗。

□ 作者任教于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原载《观察》（7 / 4 / 2003）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